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朝戈金 主编

走向新范式的中国民俗学

施爱东 巴莫曲布嫫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朝戈金 主编

走向新范式的中国民俗学

Towards A New Paradigm of Folkloristics in China

施爱东 巴莫曲布嫫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新范式的中国民俗学 / 施爱东, 巴莫曲布嫫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61 - 5515 - 8

I. ①走… II. ①施… ②巴…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687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刘勇勤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75
插 页 2
字 数 385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自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 (W. J. Thoms) 于 19 世纪中叶首创“民俗” (folk - lore) 一词以来, 国际民俗学形成了逾 160 年的学术传统。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百年来的发展几起几落, 其中数度元气大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这一学科方得以逐步恢复。近年来, 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学理依据正是民俗和民俗学) 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倡导, 民俗学研究及其学术共同体在民族文化振兴中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 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是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顾颉刚、容肇祖等人长期工作的机构,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较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学者, 他们大都处于学术黄金年龄, 成果迭出, 质量颇高, 只是受既有学科分工和各研究所学术方向的制约, 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能形成规模效应。为了部分改变这种局面, 经跨所民俗学者多次充分讨论, 大家都迫切希望以“中国民俗学前沿研究”为主题, 以系列出版物的方式, 集中展示以我院学者为主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的晚近学术成果。

这样一组著作, 计划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从内容方面说, 这套书意在优先支持我院民俗学者就民俗学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成果, 也特别鼓励田野研究报告、译著、论文集及珍贵资料辑刊等。经过大致摸底, 我们计划近期先推出下面几类著作: 优秀的专著和田野研究成果; 具有前瞻性、创新性、代表性的民俗学译著; 以及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 每年择选优秀的论文结集出版。

那么, 为什么要专门整合这样一套书呢? 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考虑, 我们觉得, 民俗学研究力量一直相对分散, 未能充分形成集约效应,

未能与平行学科保持有效而良好的互动，学界优秀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被本学科之外的学术领域所关注、进而引用和借鉴。其次，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没有一种学刊是国家级的或准国家级的核心刊物。全国社会科学刊物几乎都没有固定开设民俗学专栏或专题。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学刊繁荣的情形相比较，学科刊物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限制了民俗学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影响力的发挥，严重阻碍了民俗学学术梯队的顺利建设。再者，如何与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接轨，进而实现学术的本土化和研究范式的更新和转换，也是目前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因此，通过项目的组织运作，将欧美百年来民俗学研究学术史、经典著述、理论和方法乃至教学理念和典型教案引入我国，乃是引领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方向的前瞻之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最后，近些年来，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也频频推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适时调整，这就需要民俗学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检验，并随时就我国民俗文化资源应用方面的诸多弊端，给出批评和建议。

从工作思路的角度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着眼于国际、国内民俗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整合、介绍、分析、评议和田野检验，集中推精品、推优品，有效地集合学术梯队，突破研究所和学科片的藩篱，强化学科发展的主导意识。

我们期待着为期三年的第一期目标实现后，再行设计二期规划，以利我院的民俗学研究实力和学科影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确保我院的民俗学传统在代际学者之间不断传承和光大。本套书系的撰稿人，将主要来自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民俗学者们。

在此，我代表该书系的编辑委员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院科研局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朝戈金

目 录

新中国民俗学的历程(代序)	朝戈金(1)
约翰·弗里与晚近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走势	朝戈金(7)
我们的学术观念是如何转变的? ——刘锡诚:从一位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看学科的 范式转换	吕 微(22)
“中国民俗学史回顾与前瞻”专题讨论	(99)
《民间文学的存在论》:批评与反思	(118)
陈泳超新书稿《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座谈会纪要	(166)
民俗学的对象、功能和方法 ——评施爱东《倡立一门新学科》	耿 羽(197)
学术史的外部环境与内在理路 ——评施爱东《倡立一门新学科》	张志娟(211)
评吴乔博士《宇宙观与生活世界》	孟慧英(216)
从体裁学到体裁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学理论范式的转向 ——评西村真志叶《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	王素珍(220)
满族说部的创新之作 ——评高荷红《满族说部传承研究》	王 卓(241)
回答当下口头传承核心问题的一部力作 ——评高荷红《满族说部传承研究》	杨旭东(246)

道士羽化后,神性建构时

——评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

造成史》……………黄景春(251)

田仲一成《古典南戏研究》的中国学特点……………吴真(257)

田仲一成对于《琵琶记》版本研究的贡献……………丁剑冰(259)

版本研究与演出形态的结合

——评田仲一成《古典南戏研究》……………王哲(266)

一部节日文化研究的力作

——评张勃《唐代节日研究》……………邵清风 刘晔原(271)

断代节日研究的佳作

——评张勃《唐代节日研究》……………王加华(276)

评吴晓东《〈山海经〉语境重建与神话解读》……………李川(281)

郑土有《吴语叙事山歌演唱传统研究》评介……………黄景春(291)

在“生活之流”中安妥民间?

——评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祝鹏程(295)

民俗学视域中丧葬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

——评陈华文《浙江民间丧俗信仰研究》……………赛瑞琪 郑土有(302)

室井康成《柳田国男民俗学构想》简介……………乌日古木勒(309)

国际史诗学若干热点问题评析……………朝戈金(312)

文艺民俗学:近三十年交叉研究走向……………陈勤建 沈梅丽(331)

2013 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年度报告

——以神话、故事和传说研究为主……………安德明 祝鹏程(335)

共叙百年情谊,期待全球合作

——日本民俗学会常务理事菅丰谈中日民俗学

之交流动向……………朱倩 范雯(353)

新中国民俗学的历程(代序)

朝戈金*

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道路充满了曲折和困难，今天，又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具有再创辉煌的良好条件。

从北京大学发端的五四“歌谣学运动”，为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颇有声势地掀开了帷幕，但随后的行进步伐却并不稳健。史称“中大时期”和“杭州时期”的两个阶段，为学科的后续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铺垫，但人手不足、成果稀少、影响有限的局面，并未改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俗学迅速在整体上进入我们称之为“休眠”的时期。直到改革开放，中国民俗学学科重建的口号才再次提出，聚集队伍、编写教材、推出成果、扩大宣传……才有了今天的学科局面。

一 民俗学会三十年成就辉煌

1978年，钟敬文先生邀请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六位学者，就民俗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随后撰写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由此“七教授倡议书”在学术史上传为佳话。此举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任领导胡乔木、周扬、于光远等同志的高度重视，民俗学被列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学的学科规划。由于感到成立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的某些条件尚不充分具备，社科院领导建议先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以推动相关工作，为研究机构的创办做铺垫。经过几年的酝酿和筹备，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钟敬文教授当选为会长。对于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言，学会的成立意义重大。一大批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同仁，团结在学会周围，为民俗学的恢复和发展，齐声呐喊，齐心行动：一些重要的全国性会议先后召开；人员培训的工作也及时开展起来。一些相邻学科的著名专家，如费孝通和季羨林先生，也纷纷参与到民俗学的人才培训和鼓动工作中来，为民俗学的再次起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随后，一些国家层面的“集成”类的工作，也渐次开展起来，例如对民间文学的大规模搜集和整理工作，不仅及时启动，而且通过带动大批人员参与工作，以特殊的方式，扩大了民俗学的影响，也使大批的民俗学从业人员得到初步的培训。

在各地高校，民俗学学科的恢复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些专业人员，聚合在了民俗学的大旗下，筚路蓝缕，开始了艰苦的学科和课程设置工作。教材和参考资料的编纂，研究成果的发表，外国同行研究成果的译介，都飞快地进行着。民俗学从一个长期休眠的学科，变得重新有了生机和活力。特别应当提到，民俗学界彼时普遍认为，传统民间文化总体上处于濒危状况，需要尽快启动抢救和保护工作，在这个共识的推动下，民俗学者们在调查、搜集、整理、研究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很有价值的事情。这些工作为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彰显了这个学科在研究民众知识方面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二 助推国家时间制度完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民俗学会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前两任会长钟敬文教授和刘魁立研究员，作为学科的领军人物，在规划学科的核心问题和前进方向等重大事项上，发挥了统领全军的作用。在体制内的各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经营，与超越具体机构而在全中国搭建平台发挥作用的中国民俗学会相辅相成，使民俗学在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凝聚人气、扩大影响等方面，进行得有声有色。从一个国家级学术团体的角度看，中国民俗学会竭尽所能地发挥了一个学术团体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如组织和协调全国学者力量，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上发挥影响力，同时在地方层面推动各地的民间文化学术工作和抢救保护工作等等，也逐渐使民俗学从一个冷僻的、不大为人所知的学科，发展成为今天颇具媒体和公众影响力的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通过民俗学的影响力，改变了国家的时间制度。

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民俗学会先后受中央文明办、文化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委托，组成课题组，完成了“中国节假日体系研究”课题和“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报告。其间中国民俗学会连续召开了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传统节日与法定假日”、“中华民族新年庆典与习俗”、“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等重要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将这些成果分别结集为学术专著公开出版。中国民俗学会课题组关于传统节日的理念，助推了2005年6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民政部、教育部五部委联合下发文件《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第一次以发布官方文件的方式正面对待传统节日。随后，2007年底国务院颁布《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调整方案》，增设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为国家法定假日，自2008年起实施。近百年来传统节日被排斥在国家时间制度之外的历史至此结束。可以说，在推进“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假日体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当中，中国民俗学会为国家决策部门提供智力支持，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最终促进了国家时间制度的改革完善。

三 民俗研究与非遗研究相辅相成

中国民俗学学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结合，是近十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桩重要事件。从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始的对“民间创作”，进而对“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重视和强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晚近重大举措中影响最大、成果最多的领域。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公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政府不仅很快成为其缔

约国，而且也以超乎想象的热情，大力投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中国的民俗学学者们，也迅速以极大的激情和学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热潮当中。以一大批著名民俗学家为代表的知识界人士，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社区和民众的传统文化事象做出阐释和分析，为各级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描述、搜集、整理、申报、评估、建档、研究、传承、复兴等工作，提供大量的咨询和建议。这种深度介入，使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复兴，具有了别样的风采；民俗学也在这种彰显了学科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当中，成为各级政府和各民族群众都关心的领域。

民俗学力量的介入，体现在诸多方面，这里仅举一个事例：2004年，受文化部有关领导的委托，在文化部周小璞先生和中国民俗学会时任会长刘魁立先生的主持下，成立课题组，承担起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和反复修改历时10个月，征求了十多个国家部委的意见；前者作为《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一”于2005年3月26日由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颁布。

就以大规模参与国家某个层面的工作而言，也很少有哪个学科能够像民俗学这样发挥作用的。大批中国民俗学学者积极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工作。在国家层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有数量可观的民俗学学者，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环节的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智力支持，如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讨论与审定工作，参与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项目的各类审查、评估和撰写申报书等工作，在国家的非遗人才培养、项目评估等方面，也有广泛的介入和参与。在地方层面，大批民俗学工作者直接参与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研究与保护工作，成为各地非遗工作的中坚力量。

在2012年6月召开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四届会议”上，中国民俗学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咨询机构，获得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的地位。这是中国民俗学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不仅表明中国民俗学会作为专业学术团体，在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定领域所具有的“能力、

专业知识和经验”得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的充分认可，也意味着中国民俗学界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学术实践和工作实绩，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可以展望，中国民俗学会正式进入政府间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库后，将在推广《公约》精神，参与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相关利益方的非遗保护实践及其策略制定提供智力支持等环节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 立足本位的学术交流

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一直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因而可以说一直是一个相当“本土”的学科。不过，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最早还是从西方学术体制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根儿上说民俗学的学科理念、方法和宗旨，也都离不开其西方渊源。所以，民俗学从在中国发端肇始，就广泛借鉴吸纳外国经验，也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今天，中国的民俗学界，格外加强和扩大了与国际学界和机构的对话与联系。大量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以各种方式被介绍到中国来，尤其一些 19 世纪和 20 世纪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民俗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也得到国际同行学者的关注和肯定，中国的史诗研究已经率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民俗学界已经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芬兰、爱沙尼亚等国家的民俗学组织建立了各层级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就人才培养、学术调研、专题研讨等进行了广泛合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俗学会与美国民俗学会已经建立了制度性交流平台，每年举办学术论坛，定期互派青年学者进行学术访问，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领域，由两国民俗学会参与的“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成为两国非遗领域十分重要的合作渠道。中国民俗学会还与日本民俗学会签署了合作协议书，为中日两国民俗学界今后的学术交流建立制度性保障。

目前，我们正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计划推出《中国民俗学年鉴》。中国民俗学网在国家级学会的网站中，表现抢眼。截至 2014 年 6 月底，中国民俗学网主站共发布文章 9 043 条；民俗学论坛注册会员 9 985 人，主题帖 29 001 个，论坛总页面流量达 2.88 亿人次，来访 2.46 亿

人次；民俗学博客开通空间数 926 个，话题圈 58 个；民俗学论坛的高校版区已有 46 所高校设版。在教学和科研领域，民俗学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并以民俗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名目，形成了数十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为学科的后续发展，为民俗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内，开辟了一个制度化保障的平台。就目前的管理格局看，民俗学是社会学的二级学科，而民俗学作为一个深具人文色彩的领域，其发展态势和评价体系，仍然受到统领学科的规制，今后如何调整民俗学的学科姿态，如何按照民俗学自身的特点发展，仍然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

五 复兴之路任重道远

从再度复兴以来，中国民俗学从起初的鲜为人知，到今天已经广泛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参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了民俗学科的独特价值，并以深度介入现实生活彰显了它的存在意义。当前，立足学科本位，培养高水平人才，推出学术精品力作，是民俗学能够独立于中国学术之林的根本。发挥学科贴近民众生活的巨大优势，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民俗学也将会大有作为。

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进步为民俗学学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现实使中国民俗学面临更多的挑战。面向未来，中国民俗学必须对内自强学科实力，对外加强国际合作，确定学科本位，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学科特点的发展道路。

约翰·弗里与晚近国际口头 传统研究的走势

朝戈金*

约翰·迈尔斯·弗里 (John Miles Foley, 1947—2012), 国际著名的史诗学者、古典学者和口头传统比较研究专家。生前为美国密苏里大学威廉姆·拜勒杰出人文学术教授, 校董会古典学和古英语教授, 口头传统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 CSOT) 主任, 《口头传统》学刊 (*Journal of Oral Tradition*) 创刊人和主编, e 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Research) 主任, “通道: 口头传统与互联网”项目 (*The Pathways: Oral Tradition and the Internet*, 以下简称“通道项目”) 主持人, 口头传统研究国际学会 (ISSOT) 发起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口头传统研究中心首席学术顾问。

作为当今“口头程式理论”旗手, 弗里完成了从古典史诗向口头史诗研究的转折; 他创用了“大词”和“传统指涉性”等概念, 建立起口头诗学的理论体系; 他近年极力倡导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口头传统研究, 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人文学术的格局和走势; 他通过对口头传统和互联网两者的并置和比较, 总结出人类“思维通道”的某些规律和特点。总之, 其学术建树极为可观, 未来影响必定将日益扩大。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一 从古典史诗到口头史诗：“口头程式理论”的当今旗手

弗里长期致力于口头传统的比较研究，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古希腊史诗、中世纪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南斯拉夫语和民俗学。说到他的专业功力和学术贡献，我在不久前应邀为学刊 *FABULA*（一本在德国出版的专门研究民间故事的学术刊物）所写的学术性唁文中，做了如下概括：“弗里教授通晓法语、南斯拉夫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古英语和中古英语等。在其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和编写了 20 种著作，刊布了 200 余篇论文，领域涉及文学、民俗学、古典学、语文学、口头传统研究和信息技术等，其学养之厚、造诣之深、视阈之宽，罕有其匹。”^①

弗里出身医学世家，父母期望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为此甚至不许少年弗里骑自行车，怕摔坏了指骨影响将来做精密手术。好在他一个姑姑深爱文学，精通法文，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早年在马萨诸塞大学艾姆斯赫斯特学院接受了扎实的古典学训练，后来又有机会追随“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亦称“帕里-洛德理论”或“口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掌握南斯拉夫语，曾多次深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进行口头诗歌的田野调查。于是，他的学术视野从拉丁和希腊，转向当代活态口头史诗的传承研究。他关于史诗的最初一批成果——既讨论古典学话题又进行当代活态口头传统的阐释，便是他直接通过田野实证，又广泛参考了收藏于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帕里口头文学特藏”中的南斯拉夫材料的结果。

中国学者对弗里的最初了解，主要是从其学术史研究和史诗研究开始的。在他的众多著述中，大家较为熟悉的，主要有《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汉译本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① *Fabula: Zeitschrift für Erzählforschung*, Volume 53, Issue 1-2, Pages 111-113, DOI: 10.1515/fabula-2012-0010, December 2012.

版社 2000 年版) 和《怎样解读口头诗歌》(*How to Read an Oral Poe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2, 汉译本即出) 等。他所主编的《口头传统教程》(*Teaching Oral Traditio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98) 与作为“布莱克威尔古典世界导读丛书”之一的《古典史诗导读》(*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也颇受学界赞誉, 成为国内几所高校的教学参考书。^①

20 世纪 80 年代, 弗里便开始集纳材料, 完整地编撰了关于“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索引。正是利用自身深湛的语言学功力, 本着旁搜远绍的治学态度, 他广泛搜求世界各地直接或间接运用“口头程式理论”的学术成果, 为学界提供了详备、扎实的文献索引^②。在此基础上, 他撰写了该理论的学术史, 接着围绕史诗研究专题完成了几本分量很重的著作, 将前辈的学术论见发扬光大, 如《传统口头史诗: 〈奥德赛〉〈贝奥武甫〉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归来歌〉》(*Traditional Oral Epic: The Odyssey, Beowulf, and the Serbo-Croatian Return So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内在的艺术: 传统口头史诗的结构与意义》(*Immanent Art: From Structure to Meaning in Oral Traditional Epic*,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演述中的故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以及《荷马的传统艺术》(*Homer's Traditional Ar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等。

在这些著作中, 弗里倡导并实践了一种基于“帕里-洛德”学术精髓的拓展和深化, 带动了国际史诗研究的范式转换。例如, 对口头演述是一种“内在的艺术”(immanent art) 的概括, 其与芬兰史诗研究大师劳里·杭柯(Lauri Honko) 的史诗是“超级故事”(“super story”) 的论断交相辉映。由于是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史诗艺术的特质、演述规律、流布方式、传承人角色等问题, 弗里相继提出的概念工具实际上也逐步构筑起较为完整的史诗学术语体系。其中最为学界称道的, 是“演述场”(per-

① 弗里一生的学术著述目录, 详见 R. Scott Garner,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Works by John Miles Foley, in *Oral Tradition*, Volume 26, Number 2 (Festschrift for John Miles Foley). <http://journal.oraltradition.org/issues/26ii/garner2>。

② 该索引(Oral-Formulaic Theory: Annotated Bibliography) 经几度更新后的电子版本, 可在密苏里大学口传中心的网站上找到: <http://www.oraltradition.org/bibliography/>。

forming arena)、“大词”(large word)、“史诗语域”(epic register)、“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传奇歌手”(legendary singer)等深具哲理内涵的学术性概括。简而言之,弗里的史诗研究,是从语文学和古典学出发,广泛引入人类学、民俗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从而标举出一种眼界开阔、气度宏大的研究风范;西方古典史诗与当代活态传承的口头史诗,都得到了深湛的解析和系统的阐述。

应当说,就史诗理论建设的成就而言,特别是就整体超越基于古典学或文学的史诗研究而言,他与劳里·杭柯宛如双星闪耀,共同营造了国际史诗研究的令人炫目的景象。虽然弗里的田野基地主要在南斯拉夫,杭柯的田野经验主要来自芬兰和印度,但他们二人在对史诗文本形态进行分类方面,高度契合。他们两人共同界定的“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今天在国际学界已被广泛使用,因其很好地概括了文人从民间收集素材和片段,再经过编缀和整合,形成民族史诗的情况。这也为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和在世界各地的类似情况,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近年中国学者在讨论“满族说部”这一文类时,也借用了该学说。顺便说一句,在如何界定史诗这个世界性文类现象上,弗里与杭柯的意见也高度一致。在其撰写的《类比:当代口头史诗》一文(收入《古典史诗导读》)中,弗里引述了杭柯关于史诗的定义:“史诗是关于范例的宏大叙事,起初由专门的歌手当作超级故事来演述;较之于其他叙事,史诗篇制宏长,表达充满力量,内容意蕴深广,并在史诗接受的传统社区或群体中成为认同表达的一个资源。”^①弗里接着评述说,杭柯的史诗界定,好就好在没有以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圭臬,而是强调了史诗作为特定人群认同的标志性功能,并为史诗多样化的风格、主题、出场人物、传唱歌手、演述方式、宗教性或世俗性内容、韵体或散体以及其他参数,留下了考察的空间。^②

在美国,弗里早已成为公认的“口头程式理论”的当今旗手。这里我还想指出,弗里的史诗研究,与劳里·杭柯的史诗研究一道,都

① 原文见于 Lauri Honko, *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98, p. 2.

② “Analogues: Modern Oral Epics.” In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pic*. Ed. by John Miles Fole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 199.